

心智障碍者家庭特殊需要信托,失能失智群体长期生活保障机制探讨——

托付未来生活,让“星星”不再暗沉

本报记者 奚冬琪



一名40岁左右的心智障碍者,白天在社区庇护工场上班,晚上下班回家和父母一起吃住,陪父母步入古稀之年,日常开销并不算高。这家总共准备的养老资金有200万元,其中有100万元预备给心智障碍孩子用作未来20至30年的长期照料保障资金。前不久,父亲突然查出重病,需要150万元动手术医治,这一突发状况一下子把这个家庭推上了两难的境地:是花掉未来给孩子生活的资金为父亲治病,还是选择父亲保守治疗,不动用这100万元?像这样令人难以抉择的生死故事,几乎每天都在有着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家庭中发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研究,随人口、医疗、老龄化的持续增长,预期寿命超过70岁的国家中,残疾人将不断增加,每个人将有平均8年、11.5%的生命在残疾中度过。因此,向民事行为能力不足或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群体提供信托服务,已成为未来全社会的重大课题。日前,由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指导,浙江省孤独症人士及亲友协会、北京市晓明助残基金会联合主办,宁波市星宝自闭症家庭支援中心承办的“托付与生活”心智障碍人士特殊需要信托论坛在宁波举行,希望能够找到“家长离去,心智障碍孩子怎么办”的新路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研究,随人口、医疗、老龄化的持续增长,预期寿命超过70岁的国家中,残疾人将不断增加,每个人将有平均8年、11.5%的生命在残疾中度过。因此,向民事行为能力不足或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群体提供信托服务,已成为未来全社会的重大课题。

社会广泛讨论。

在陪伴儿子36年的过程中,田惠萍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等到自己不在的那一天,谁来帮助解决杨弢的问题?因为她知道,这不是杨弢一个人的事情。只解决杨弢一个人的问题,是没有用的,身心障碍者群体需要的是一个支持体系。同时,为了托付一个生命而牺牲另一个生命,对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的基本职能而言,也是落后的。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尊严,不能托付给另一个人,这需要社会保障来承担。基于这样的想法,田惠萍陆续咨询了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尝试通过遗嘱、保险等方式来安排好杨弢的终身生活,但她的律师朋友直言相告,不论设置几层遗嘱或安排,都很难实现财产隔离和风险隔离。

后来,田惠萍找到了“信托”这一方式。即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通过信托财产的管理与信托利益的分配,保障委托人孩子的干预治疗、托养看护、医疗健康、高质量休闲服务、心理健康咨询等费用支出以及实现家族财产持续而稳健的资产配置,让这些孩子后半生无忧。同时,信托还可以接受社会捐赠,成为公益行动的一部分。

2021年3月,光大信托落地了国内首单身心障碍服务信托,旨在通过信托制度的架构优势,为身心障碍者探索提供一个可选项、可持续、可信赖的解决方案,以信托方式解决身心障碍者家属的终极问题。在经过了解和权衡后,9月23日,田惠萍与光大信托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信托合同及系列文件,成为全国首位签署特殊需要信托的孤独症人士家

长。“我一生的成就为了杨弢能欢笑,现在我知道我死了杨弢的微笑仍然能存在,这让我感到非常幸福。”田惠萍说,签署完文件的那一刻,感觉自己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因为这意味着她从此不再有后顾之忧。

身心障碍服务信托,期待探索更多幸福之路

虽然已经有人迈出了第一步,但是身心障碍服务信托仍在探索阶段,未来的路还很长。

长期参与信托研究的北大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教授认为,养老和助残等社会问题的痛点或难点不仅体现在社会服务严重不足,还体现在无法精准匹配到服务对象。目前,如果父母想为残障子女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金,民法典里确立的成年监护制度无法完全解决此类需求。现在多数金融管理机构可以进行资产保值与增值,但又无法向市场购买服务且精准送到子女身上。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和相应监督机制的缺乏,将子女的监护权与财产处置权交给他人(意定监护)或基层政府也难以实现,在现有的制度功能中还找不到此类问题的解决方式。因此,如何推动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在社会保障中分担责任、做出贡献成为重要课题,特殊需要信托则是撬动各方需求的机制之一。

2020年9月,在金锦萍教授以及多位心智障碍者家长、机构的倡议呼吁下,深圳市残联、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发布了《关于促进身心障碍者信托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论坛现场,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侯伊莎谈到,参与和推动《意见》出台,并首次

以文件形式把残疾人称为身心障碍者,是为了打破过去只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角度做残疾人工作的思路和工作格局,转变为通过调动全社会,特别是金融力量以无障碍城市建设的视角,去设计、规划、建设和管理无障碍城市,使残障者及其家属作为主体在生活、工作和融合社会中无障碍。《意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深圳率先为身心障碍者构建起了公益信托的相关法律关系,并使公益信托制度运转起来,让身心障碍者及其家属能够拥有更大、更多的财产安排空间,以探索更多的幸福之路。

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温洪表示,中国精协一直在尝试探索一个符合工薪阶层特殊需要家庭的信托服务可能性。她认为,不包含服务采购的信托机制,无法解决特殊需要家庭的核心目标——为孩子获得更多元的服务选择,才能让家长得到安慰。因此为推动服务保障体系的建立,下一步中国精协将遴选10-20家符合条件的大龄服务机构,在北京、南京、上海和广州四个城市启动试点,就信托服务需要配套的服务体系建立实验性平台。

对于如何催生更多能够满足心智障碍者多元需求的服务的问题,北京市晓明助残基金会执行理事李俊峰在分享时指出,家长在设立信托服务后,可以逐步清晰明确出自己的照料和监护理念,告诉监护人、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自己孩子而言什么是高品质的生活,把包括生理、情感、自我实现等层次的需求逐步提供出来,从而促进大龄服务行业服务品质提升和服务多元化发展。关于家长未来如何选择监护人,李俊峰认为选择公益性质的家长组织或相关社会组织,是更加稳妥、长期可持续的。

重庆长寿:群众心声转化为社情民意信息

政协“小信息”解决“大问题”

通讯员 张异 本报记者 凌云

几百字的文字能解决什么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在重庆市长寿区政协,心系“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委员们,将群众心声转化为社情民意信息,让“小信息”里的政协智慧,融进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中。

为发展支招:建议融进“十四五”规划

“相关建议要充分体现在‘十四五’规划和年度工作中。”近日,在长寿区政协报送的社情民意信息《关于重视“虹吸效应”冲击 警惕常住人口流失的建议》上,长寿区区长戴明作出批示,并要求建议涉及的区发改委、区经信委、区教委等5个部门研究吸纳。

自己的建议能引起区领导的共鸣和重视,让区政协委员周成伟很欣慰。

今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周成伟的关注。细心的他发现,相比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长寿区常住人口减少7.7万人,减少了10%。

“家乡的常住人口为啥不增反降……”一条看似平常的新闻,却增加了周成伟的疑虑,他挤出时间深入调研,努力寻找问号背后的答案。

在这篇社情民意信息中,周成伟建议把该问题纳入区级重要课题开展调查研究,统筹集中应对,并围绕“提升中小学教育质量、引进高等院校、促进生态环境与产业融合发展、提升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为民生建言:边角地变身小公园

登山健身、林下休憩、亲水互动……占地240余亩的圣天公园,每天都吸引着成百上千的市民前来休闲娱乐。这片曾经的“城市边角地”,如今已成为长寿区的“城市会客厅”和“网红打卡地”。

近年来,长寿城市化进程全面提速,城市公园建设倍受委员关注,与此相关的提案、社情民意达20件以上。

两年来,杨华林、王世平、王正伟、艾明刚等多名委员,先后提出“利用城区边角地修建社区文体公园、进一步完善公园周边配套设 施、加强公园后期管护”等建议,为长寿城市品质提升助力。

“看到曾经的边角地,一步步成为城市的一抹亮色,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很有成就感。”王世平说。

为履职助力:“我为群众办实事”有了建言直通车

一条两百字的社情民意,就解决了居民出行困惑,这让九三学社社员石建平建言资政的劲头更足了。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长寿区政协专门开通“我为群众办实事”建言直通车,将三五篇短而精的“金点子”,集纳汇编为一期《政协委员专报》,报送给区政府分管领导和相关 部门,助力“我为群众办实事”。

今年初,因为车辆碾压,长寿古镇临桃源西三路沿街人行道路面破损严重。这让周边居民有些苦恼:出行不安全,也影响长寿形象。没过几天,石建平便将收集到的民声写成一篇社情民意。随即,区政协将此信息与近期多篇社情民意一起,汇编成一期《政协委员专报》。

“几条建议均有道理,请城管局认真吸纳,研究解决,结果报区政府及政协。”在分管副区长张明方批示后,城管部门第一时间对破损的人行道进行修缮,落实专人负责古镇区域的巡查,确保市政设施维修维护及时到位,并及时将办理结果反馈区政协。

今年以来,长寿区政协累计汇编的《政协委员专报》16期、近68条民情小信息,得到相关区领导批示和部门采纳,背街小巷照明、车辆停放占用人行道、城区垃圾站点灭鼠等一批民生热点问题得到解决。

基层治理不能一应俱“长”

丁慎毅

河长、塘长、林长、路长、栋长、楼道长……近年来,一些地方推进治理机制创新,各种“长”纷纷出现。这类创新有效推动基层治理责任压实,赢得了许多干部群众认可,但是有的运行效果不佳,受到干部群众的质疑。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建议,基层治理机制创新时要补足配套设施,避免概念先行、形式大于内容等问题。

基层治理之所以一应俱“长”,初衷在于解决“九龙治水”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专人专干,有利于消除推诿、扯皮等现象,有利于精准追责。但是,如果各个“长”们只是被动接受上面的工作安排,只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分配资源,而不是创新工作方式或相关部门把权力下放给各个“长”们,则容易出现“某长制”流于形式。

以“河长制”为例。2016年12月,《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正式出台,各地区各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全面落实河长制安排。可以说,在数以万计的河流之中,几乎每一条河都有人管,每一段流域都有河长,全面负责河流的治理问题,推动水生态环境整体改善,在一些地方确实出现了喜人的成绩。但从中央环保督察组曝光的种种污染乱象来看,河长制在某些地方则是名存实亡,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只是河边多了一块公示牌,挂了个河长的名字。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或者是一些地方面对经济压力,“河长”也得服从更高级“长”的安排,对污染装作看不见。或者是“河长”本身权力不够大,无法调动相关资源对河流治理加以配套。

迷信一“长”就灵,简单一“长”了之,该下放权力却不下放,该整合的资源却

不整合,该推动的创新却不推动,这样的一应俱“长”,反倒成了一种懒政。

因此,要让“某长制”名副其实,“长”出公平与效率,就要合理进行资源配置,让各级“长”们权责平衡,就要加强党建引领,通过共享共建共管来巩固各级“长”的积极性和权威性。同时,对于那些类似基层“田长”“楼道长”之类的小“长”,不妨合并同类项。比如“田长”,基层干部就认为:“保护耕地质量的主体应该是种植的农民,靠‘田长’的监管,属于本末倒置。”

再以各地推行较好的“路长制”为例。山东省济南市不是一“长”了之,而是通过“行走城管+路长制”来创新城市管理新模式。济南市城市管理执法系统整合党建、队伍、业务、科技、数据等资源要素,创新推出单兵、前置、互联、科技、舆情、携手“行走六法”,把“问题清单”变为“满意清单”。上海浦东新区一方面线上开通“路长制”微信公众号,投放网格信息、路长制新闻资讯等,促进路党支、路促进会、商户等线上互动,另一方面,升级完善“道路党组织—道路社会责任促进会—合署办公会”三层架构体系,道路促进会下设4个专委会,由市场监督管理所、派出所、门自治组织、总工会和劳动保障事务所承担,创新实践“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理念和“共有、共建、共享”的“三自三共”治理模式。这些做法,才是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充分发挥科学配置资源和基层治理体系的好经验。



年轻人缘何不愿“相亲”?

——专家呼吁“低婚恋意愿”问题应予重视

本报记者 熙宁

现在年轻人由于忙工作而耽误婚姻的很多,加之有些单身男女比较腼腆,鲜少参加社交活动,他们的婚姻大事就成了父母的一块“心病”。

家住厦门市思明区的高岚说,“每逢假期家里必定会安排相亲,感觉既浪费了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又让心情变得糟糕,导致我现在害怕放假,宁可去加班。”高岚说,母亲为了这事都气得快抑郁了,每次都说:“我们给你安排相亲,你为什么总是拒绝?”高岚今年32岁,在父母眼里是一个“大龄剩女”。对于拒绝参加相亲,她说:“我觉得相亲的方式不适合我,我希望通过自己寻找到中意的对象。”

像高岚一样内心抵触父母安排相亲的单身男女不在少数,在厦门经营一家餐吧的黄芳说,父母总认为她工作忙,没时间去找对象,他们唯一能帮忙的就是给她安排相亲。可在黄芳的观念里,她不愿意参加相亲活动。“所以我都拒绝了,

现在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僵。”

为何单身男女如此抵触父母相亲的安排?微博上网友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人说相亲没面子,不想早结婚的;有人说相亲是交易,是对爱情的亵渎,希望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解决;也有人说相亲是亲情对爱情的绑架……对此,婚姻家庭咨询师吴丽英认为,对于该不该接受父母安排的相亲,其实首先要弄懂相亲的真实意义。相亲是一种快速结识对方,找到对象而成交的捷径方式。相亲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人的想法,是乐于其中,还是心理抵触。

吴丽英建议单身男女换位思考,从父母的角度来解读或许会少一些抵触。“父母知晓结婚的最佳时期,也想趁着自己年纪不大,在有能力的时候帮儿女带小孩;也有父母想通过婚姻,让孩子早点担当起家庭责任,真正成熟与定性。但他们还是忽略了

跟儿女的沟通。”吴丽英说,父母通常以先入为主的观念,选择自己认为不错的“对象”再介绍给孩子。也恰恰是这样的观念,让孩子们有了抵触心理。很多年轻人表示,在相亲之前,父母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也没有人问过他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

对此,遇见网资深情感顾问林佳建议,父母可事先跟儿女商量自由寻找对象的时间,在最后期限还没找到心仪对象的话,那就得听从父母的相亲安排,且依据儿女喜欢的类型去找对象。她还表示,有些年轻人的相亲焦虑是没有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应该要根据自己的个性和接受度,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最大限度在相亲场合中表现自己。目标明确,才能事半功倍。”

另外,由抵触相亲间接指向不想结婚,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隐忧。厦门市婚姻家庭和谐研究会会长江振发指出,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认为结婚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这也从

侧面反映了他们为什么抵触相亲。而结婚年龄的推迟、青年的低婚恋意愿,又影响到社会生育情况,与人口发展息息相关,亟须引起足够重视。

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曾发布了一份针对2905名18岁至26岁未婚城市青年的婚恋意愿调查。在该项调查中,对于“你将来会结婚吗”,25.1%的青年选择“不确定”,8.9%的青年选择“不会结婚”,两者相加的比例高达34%。调研中,当被问及“不想恋爱”的原因时,选择“一个人很好,谈恋爱很麻烦”的比例为74.8%。

江振发说,婚姻家庭和谐不仅影响个人工作和生活,而且事关民生幸福与社会稳定。尤其在我国新阶段人口发展要求下,青年的低婚恋意愿,亟待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他建议,除了要引导单身男女进行观念上的引导之外,也要将相关问题纳入相关政策调整中予以统筹考量,这样才能提升单身男女的婚恋意愿。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积极发展特色产业,采取“支部+合作社+公司+农户”模式不断完善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图为近日,该市红花岗区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统一战线农技员到海龙镇温泉村帮群众采收葡萄。邹松摄